

蔣中正陸軍思維下的海軍建設： 以臺灣潛艇部隊的建立為例 (1949-1975)

曹少滋

摘 要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抵臺北後，蔣中正隨即成為黨國體制下的軍政最高領袖。他陸軍出身的背景與軍事強人的自我認知，對此後的海軍建軍產生重大影響。蔣中正積極推動反攻大陸的各式計畫，大多運用陸軍的作戰思維，包含以特種作戰等方式突襲中國大陸沿岸。而中共在應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攻勢作戰中，建構出以潛艇、快艇等兵力為主的近岸防禦體系。當臺灣長期忽視海軍建軍之際，中共潛艇的作戰能力已逐漸成熟，且可穿越海峽。國軍長年按蔣中正的思維建軍，雖然在1969年建立了第一支潛艇部隊，但無法與中共的水下力量抗衡，甚至協助海軍自身反潛訓練的能力也不足。在此急迫的環境下，中華民國與美國展開多次斡旋，耗時多年後，最終僅獲取兩艘常規潛艇，且屬於沒有攻擊能力的「訓練設備」。本文將探討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在陸軍思維主導下海軍的建軍發展與實際能力，以及因應反攻大陸特種作戰需求而建立的潛艇部隊，並藉由中華民國潛艇部隊建軍的論述，探討臺灣「攻勢」與「防禦」政策轉換的歷程。

關鍵詞：蔣中正、特種作戰、反攻大陸、海軍、潛艇

Naval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ang Kai-shek's Army-Centered Thinking: The Founding of the Submarine Force in Taiwan, 1949-1975

Shao-tzu Tsau*

Abstract

After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was relocated to Taipei in 1949, Chiang Kai-shek assumed suprem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state. His military background and self-image as a military strongm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e ROC navy. Chiang actively promoted various plans for a counterattack on the mainland, many of which relied on army-style combat strategies, including special operations and surprise attacks. In response to the possible ROC offens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mmediately developed submarines and speedboats under the concept of coastal defense. In contrast, the ROC military continued to adhere to Chiang Kai-shek's army-centered military thinking. Although it established its first submarine force in 1969, this force struggled to compete with the CCP's underwater capabilities and was inadequate even in supporting its own navy's anti-submarine training. In such a pressing situation, the ROC engaged in numerous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assistance. Despite years of effort, the ROC was able to acquire only two conventional submarines, which served primarily as "training equipment" without any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actual capabilities of the ROC navy guided by an army-centered thinking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relocation to Taiwan, and the belated creation of a submarine force to support special operations against mainland China. Through

* CAPT, ROC Navy (Retired)

a narra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C submarine force,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aiwan's shift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policy.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special operations, counterattack on the mainland, navy, submarines

蔣中正陸軍思維下的海軍建設： 以臺灣潛艇部隊的建立為例 (1949-1975)*

曹少滋**

壹、前言

1969年9月23日美國國務院致電駐臺北大使館，告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定期巡邏臺灣海峽的方式即將改變。電文中的A、B兩款分別提到第七艦隊執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規定的任務並不會改變，部分艦艇一如過去，繼續停靠臺灣的港口。但在C條款中卻表明潛艇不再派駐臺灣。¹ 那麼C條款的提出，對於臺灣會有特別的意涵嗎？

潛艇為攻勢作戰的利器，從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得知，潛艇可以隱匿在水下、封鎖敵人航運，給予敵方海上經濟命脈戰略性打擊。對中華民國而言，戰後

* 本文寫作過程，承蒙林孝庭、張力、陳翠蓮、劉維開、羅士傑（依姓氏筆畫排序）等諸位學者，以及匿名審查人的建議與指正，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5年9月22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11月3日。

** 備役海軍上校。

¹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mmander, U.S. Taiwan Defense Comm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September 23, 1969, 2117Z.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亦曾有機會獲得英國750噸A級潛艇兩艘，惟後續因重慶艦變節使英國不信任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等因素下取消。² 因此，潛艇新式兵種，對於臺灣屬於陌生的領域。然而，在蔣中正（1887-1975）的思維中，潛艇部隊的用途，卻有別於歐美國家。

國府遷臺後，中華民國海軍由美軍顧問團協助訓練，包含艦隊戰備操演與裝備保養等項目。其中，為提升反潛能力，特別安排每三個月派遣美軍潛艇訓練反潛作戰。³ 這項華美海軍的聯合演訓，主要目的為藉由追蹤實體的水下目標，使臺灣的水面作戰艦艇熟稔聲納運用，以及強化獵殺潛艇的能力。倘若美軍不再派駐潛艇協助臺灣，則國府於1963年10月秘密訂購的兩艘潛艇，對於支援反潛訓練，應該有備用的作法。然而，這兩艘潛艇無法長時間航行，亦無法深潛水下。就在即將失去美海軍潛艇協訓，同時面對中共潛艇能力提升的雙重壓力下，緊急獲得常規潛艇成為1969年後國府的首要工作之一。

蔣中正在臺復行視事後，國軍在遵從反攻大陸的政策下，以執行攻勢作戰為最高原則。有朝一日隔著海峽運送大批部隊順利登陸對岸發動攻勢，應為海軍的首要任務。艦隊的構成，除了運輸能力，更需要保護運輸船隊的護航能力，以及反制敵人潛艇水下襲擊的反潛能力。然而，為何到了1960年代，海軍的反潛訓練仍然需要仰賴美國，臺灣自己訂購的潛艇卻無法深潛水下對抗敵人，延伸至1969年成為蔣中正必須在急迫環境下處理的問題，這段臺灣潛艇發展的歷史在過往研究中少有述及。

在上述的討論啟發下，本文將在實踐脈絡中，分析蔣中正在臺時期海軍潛艇部隊的建構歷程，以及探討其與國軍攻勢與防衛政策的關聯性。其中與本文相關者，大致可分為三個面向：

其一：政府政策的需求。按照反攻大陸的規劃，攻勢作戰為國軍訓練與整備的核心目標。蘇聖雄的研究指出，國軍在反攻大陸政策下，發展出特種作戰的戰

² 張力等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85-86、198。

³ 金智，《海上長城：戰後中華民國海軍發展史》（臺北：獨立作家，2025年），頁267。

術構想。從1962年至1963年間，對中國大陸海上突擊與爆破等行動計有三十餘次，1963年又發動七次海上突擊。這些行動開始時尚能登陸成功，但後續都被共軍圍攻而失敗。⁴ 林孝庭指出，國府1953年兩棲突襲東山島失敗，造成3,300名國府官兵傷亡，損失兩輛坦克、兩架飛機與三艘登陸艦。臺北與美國中情局之間的游擊作戰秘密合作劃下句點。到了1965年「八六海戰」失利，蔣中正真正體認到臺灣兩棲登陸作戰能力的嚴重不足，終於放棄反攻大陸政策。⁵ 金智的研究指出，因反攻大陸政策特種作戰的需求，臺灣建構潛艇部隊，這些水中載具與常規潛艇的功能相距甚遠。且這支部隊是海軍規模最小、裝備最落後的兵種。⁶

其二：美軍的管控作為。Bruce A. Elleman指出，1952年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響應61%美國人民支持「鬆綁蔣中正」（Unleash Chiang Kai-shek）的意向，提供臺灣更多的艦艇用於封鎖中國大陸海岸，這樣的能力持續至1958年。⁷ 林孝庭指出，1961年美軍顧問團在臺灣成立十週年之際，號稱在美國的努力下，國軍得以建立一套健全的審計、稽核與預算制度。就另一個視角而言，蔣中正的軍事力量與投射能力，受到美國提供的援助與範圍而限定。⁸ 五十嵐隆幸的研究指出，1969年臺北政府受到美軍改變第七艦隊巡邏方式等政策的影響，要求美軍提供F-4型戰機與潛艇等裝備；其中，蔣中正爭取F-4型戰機的真正用意，仍是為攻勢作戰所需，卻因國務院反對，潛艇與戰機的建案均遭到參眾兩院否決。⁹

⁴ 蘇聖雄，〈間接路線：蔣經國與反攻大陸特種作戰〉，收入《冷戰與當代東亞國際政治秩序1950-1989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4年），頁23。

⁵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8-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113-114、167。

⁶ 金智，《海上長城：戰後中華民國海軍發展史》，頁259-261、281-282。

⁷ Bruce A. Elleman, *Taiwan Straits Standoff: 70 Years of PRC-Taiwan Cross-Strait Tensions*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21), pp. 26-28.

⁸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遠足文化，2021年），頁72-73、226。

⁹ 五十嵐隆幸著，林佩欣譯，《反攻大陸與臺灣：中華民國統一的構想與挫折》（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5年），頁236-242、250-251。

其三：敵情變化的應對。Bruce A. Elleman指出，國府關閉政策的結果，使中共必須透過蘇聯將其貿易轉移至陸地，如此加劇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因此，1954-55年與1958年發動砲擊，試圖打破海上封鎖。¹⁰ James C. Bussert則認為，中共於1955年開始獲得蘇聯4艘S級潛艇，之後又陸續獲得M級潛艇，這些水下裝備成為訓練中共未來潛艇軍官的搖籃。¹¹ 柴漢熙的研究提出，1965年「八六海戰」後，蔣中正發現高級將領擬訂的作戰計畫，不重視海、空的力量。蔣經國（1910-1988）亦提出，國軍的編制與訓練，對敵情的發展大多不相符。¹²

上述文獻回答了部分的問題。首先，國府的反攻大陸作戰以陸軍為主體，海軍的能力不足，其主要功能之一為支援特種作戰，於是潛艇在特種作戰的需求下建構。其次，國府的軍事力量受到美軍的塑造與控管。最後，國軍的建軍備戰，並未針對敵情變化與時俱進。惟與本文至關但未回答的問題尚有：一、反攻大陸的登陸部隊需要海軍艦隊的載運與護航，為何海軍的能力不足？特種作戰與海軍潛艇的建軍又有何關聯？二、美國在艾森豪時期曾支援艦艇，供給國府關閉中國大陸沿岸港口，時下為何沒有臺灣潛艇的相關提案或討論？三、當對岸開始發展潛艇時，國軍的反制能力是否與時俱進？為何到了1965年「八六海戰」後，才發現國軍沒有依敵情發展而整備？綜合上述，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礎上，首先討論國府遷臺後在陸軍思維主導下，海軍的建軍情形與實際能力。其次探討，為因應反攻大陸特種作戰的需求，發展出潛艇部隊的歷程，以及因臺海情勢丕變，國府在急迫的環境下，爭取常規潛艇的始末。最後，藉由蔣中正臺灣時期建立潛艇部隊的論述，探討中華民國「攻勢」與「防禦」政策轉換的歷程，以此作一結論。

¹⁰ Bruce A. Ellema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vy: Special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9), pp. 52-56.

¹¹ James C. Bussert & Bruce A. Ellem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Combat Systems Technology, 1949-2010*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1), p. 63.

¹² 柴漢熙，〈強人眼下的軍隊：1949年後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復國夢與強軍之路〉（臺北：黎明文化，2020年），頁192-193。

貳、陸軍思維下的海軍建軍

回顧蔣中正的軍旅生涯，他從1924年擔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一路到1949年國共內戰失敗，大多處理以陸軍為主的相關事務。他的夫人宋美齡（1898-2003）則協助他建立與處理空軍的事務。相較之下，海軍成為他最不熟悉的領域。因此，他需要安排信任的人負責管理。戰後百廢待舉的環境下，他先找了陸軍系統的陳誠（1898-1965），但此時陳誠負責東北「剿匪」任務，戰局惡化無法抽身，之後又找到黃埔一期的桂永清（1901-1954）。然而，桂永清接掌海軍後，爆發國共內戰期間大量艦艇叛逃等情形，到臺灣後又與蔣經國所領導的政工體系發生齟齬，爾後又有美軍介入其調職等情，讓蔣中正感到厭惡。¹³ 後續會讓桂永清升任參謀總長，主因為阻擋另一位蔣中正更厭惡的將領——孫立人（1900-1990）——的升任有關。¹⁴

由蔣中正日記中可以觀察出，在三軍的表現與演習成效上，他對於陸軍或空軍的關切大多超過海軍，並且在陸軍體系中的敵情分析、訓練與作戰的指導有其獨特的見解與能力。但對於海軍而言，從1948-1962年間，幾乎沒有國家海權的高度與海軍戰略層面的指導。日記中出現過針對艦隊「髒亂」、「有蒼蠅」等注意環境衛生之基本工作要求，¹⁵ 卻沒有艦隊作戰訓練、裝備操作與保養等要求的指

¹³ 蔣中正日記有關桂永清的紀錄概述如下：1949年3月5日「上星期反省錄：一、桂永清昏昧疏粗，毫不組織，亦無防範，屢戒不聽，鑄成此奇恥大辱，此亦辭修知人不明之應負其第一重責」。1951年6月30日「據至柔談桂永清與政治部主任趙龍文無法相容，招來面斥。若不免職，海軍絕望矣」。1952年4月3日「美軍武官致函余及夫人，如桂永清調職，則美援停止。另預判桂將運動全體海軍名義挽留，並由馬紀壯領銜，後又令馬自動撤回其挽書，可知桂之無恥極矣」。1952年「總反省錄：五、軍事最大之成就：丑、三、四兩個月海空軍總司令調職，嚴拒美國武官橫加干涉」。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頁79；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1》（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頁179；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頁8、101。

¹⁴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4》（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1954年6月21日，頁170-171。

¹⁵ 蔣中正日記中有關艦艇髒亂與要求衛生的紀錄概述如下：1948年10月7日登重慶艦指出「艦髒非常」。1951年12月20-22日校閱海軍演習，召集各艦長，訓示海軍主管官「特別

示事項。從1951年7月開始提出反攻大陸戰術、戰略研究方針，¹⁶ 直到1965年8月6日「八六海戰」失敗，對於中共海軍的發展，如潛艇、快艇的威脅等因應與研究，日記中並不多見。

1953年7月國軍在東山島戰役失敗後，蔣中正更深刻理解海軍缺乏兩棲作戰的能力。¹⁷ 這樣的結果應該發展成兩個不同的軸線：第一條軸線，將資源投注於海軍，重新建構強大的兩棲與護航艦隊，以備再次反攻之用。第二條軸線，確認臺灣的軍事力量無法單獨實施大規模攻勢作戰，應該逐漸轉變為防守海峽，阻止敵人登陸臺灣。兩條軸線中，第一條為反攻大陸攻勢作戰所需，必須建構強大的海軍，但後續並沒有實質上的建軍與配套措施。可以確定的是，第二條軸線朝防衛臺灣海峽發展，在當時並未被接受。然而，蔣中正以陸軍的思維發展出「以島制陸」的構想，將大量的軍隊運送到金門、馬祖等外島，藉此縮短與減少船舶航行的需求，以等待機會，就近跨過鄰近水域發動反攻作戰；¹⁸ 或由特種部隊以外島為前進基地，採用滲透、襲擊等作戰方式進行特攻任務。這也造就中共於第一、二次臺海危機時，以砲擊壓制外島的種種作為，並發展出「飛機、潛艇、快艇（簡稱飛、潛、快）」的近岸防禦戰略，以阻滯與削弱試圖登陸的國軍。因

應注重清潔整齊與衛生事宜」。1956年3月「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6，咸陽號有蒼蠅，應速除」。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8》（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頁269；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1》，頁344-345；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6》（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頁70-71。

¹⁶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年），頁296。

¹⁷ Bruce A. Elleman, *Taiwan Straits Standoff: 70 Years of PRC-Taiwan Cross-Strait Tensions*, pp. 23-40.

¹⁸ 王叔銘日記於1959年4月30日提到「作戰會談總統指示，一、共匪必將侵略外島且以馬祖為首要目標。二、我軍不應謹守為主，應計畫採取攻勢，以三個師之兵力擇攻平島而佔領之，此有重大意義等」。〈1959年日記〉（1959年4月30日），《王叔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063-01-01-019。此外，雷德福（Arthur William Radford, 1896-1973）曾寫信給蔣中正，敦促國軍自主撤出大膽等島，蔣中正強烈表達恕難從命。事後，美軍上將建議，應讓臺灣陸軍在特殊情況下能派遣1-2個軍到臺灣以外地區作戰。就國府而言，美國已默許反攻大陸行動。五十嵐隆幸著，林佩欣譯，《反攻大陸與臺灣：中華民國統一的構想與挫折》，頁122-126。

此，問題又回到海軍能力的建構上。

蔣中正基於對海軍的陌生，惟身為三軍統帥，仍會試圖去理解。從1953年8月12日開始閱讀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海權論述，一直到1954年1月16日審閱印製完成《海軍戰略論》（*Naval Strategy,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with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Land*）。此期間，一得空便閱讀、甚至反覆閱讀。他在日記中對於閱讀馬漢的海權理論提出了「甚覺有助於我平生學習之欠缺也」、¹⁹「此書地位應在克勞賽維茲《戰爭原理》一書之上，自覺未能早讀此書為恨」，²⁰以及「乃記為平生愛讀叢書之一」²¹等感想。一直到1959年10月18日的日記中，仍有重閱的紀錄。除代表他對於克勞賽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所著《戰爭論》（*On War*）等軍事著作之用功，也可能藉由這部運用西方陸上作戰與地緣戰略為例證的描述，讓他得以理解海軍的世界。²²但後續卻未曾見其運用此理論，指導海軍戰略或戰術的紀錄。

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象徵海軍「忠義軍風」的勝利戰役「九二海戰」，²³蔣中正在日記中並未提及。陳誠則在日記中提到「9月2日六時半，見王叔銘（1905-1998）、彭孟緝（1908-1997）、梁序昭（1903-1978）、陳嘉尚（1909-1972）。王告訴余：頃總統大罵彼等，余加以鼓勵，因三軍年來確有進步，尤其海軍今日在料羅灣之勝」。²⁴蔣中正沒有對海軍提出專業的指導，相對的，海軍

¹⁹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3》（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1953年8月29日上星期反省錄，頁240。

²⁰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3》，1953年9月2日，頁246-247。

²¹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3》，1953年12月22日，頁345-346。

²² 蘇聖雄，〈戰爭論——蔣中正與西方兵學在臺灣的發展〉，《漢學研究》，第41卷第2期（2023年6月），頁210-212。

²³ 有關海軍「九二海戰」的論述，參見黎玉璽，《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臺北：著者自印，1985年），頁19-28。另黎玉璽曾邀請國府政軍高階菁英就九二海戰勝利紀念碑題字，參見「黎玉璽呈陳誠為樹立海軍九二臺海勝利紀念碑請賜題詞」（1964年7月），〈陳誠題詞彙存〉，《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406-00009-165。

²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2015年），1958年9月2日，頁933。

本身也沒有傑出的貢獻，為三軍中較差的部隊。²⁵ 再者，由蔣中正日記所載，也可以窺探海軍的日常表現。例如：1952年6月搭乘德安軍艦出海視導，拖帶的靶具在途中為風浪折斷脫落，提出「其幼稚至此殊所不料」。²⁶ 1954年9月岸轟廈門，他與蔡斯（William Curtis Chase, 1895-1986）談到「陸軍甚佳，空軍技術雖佳而精神甚差，海軍幼稚」。²⁷ 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除未提及九二海戰勝利的觀感，則提出「海軍運輸計畫之虛偽欺瞞」。²⁸ 若就第三方視角而言，1958年時任參謀總長的空軍上將王叔銘日記中，亦能看到對海軍負面的評述，如1月29日「海軍紀律欠佳」、6月25日「海軍所報戰果不確實」、「海軍內部士氣不振作」，以及9月5日「海軍一向不注重計畫」等。²⁹ 另外，曾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的賴名湯（1911-1984）亦曾於日記中數度提出「海軍是三軍最弱的軍種」。³⁰

蔣中正長時間研究與推展「三角形攻擊戰鬥群」的戰術，這套陸上作戰思想，他卻認為可以三軍通用。其中1959年日記，今後〈反攻復國方策（二）〉，就提出「三角形攻擊戰鬥群」為「統一的用兵思想」。³¹ 實際上，海軍艦隊作戰為三度空間立體作戰，面對空中、水面、水下的威脅，有圓形或是扇形等編隊，其目的為因應防空、反水面及反潛不同的作戰型態所產生的隊形。但由1962年2月14日海軍總部呈報的《「海軍如何針對匪軍建軍思想戰略方針及匪俄慣用戰法研求制勝方策」之研究總結報告》可以窺探出，當時的海軍提出在戰鬥方面「保

²⁵ 王叔銘日記於1959年4月11日提到「總統評定47年度之三軍成績，空軍為最優95分，陸軍90分，海軍80分、陸戰隊90分，兩者相加平均則為85分」。〈1959年日記〉（1959年4月11日），《王叔銘》，館藏號：063-01-01-019。

²⁶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2》，1952年6月4日，頁154。

²⁷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4》，1954年9月7日，頁240-241。

²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8》（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58年9月6日，頁226。

²⁹ 王叔銘日記1958年6月1、13、22日多次提出海軍戰果造假，並於6月25日向蔣中正報告。另於9月5日提到「海軍一向不注重計畫」、「梁序昭無道義無決心」等語。〈1958年日記〉（1958年6月1、13、22、25日，9月5日），《王叔銘》，館藏號：063-01-01-018。

³⁰ 賴名湯著，葉惠芬等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I》（臺北：國史館，2016年），1964年10月5日及1965年11月14日，頁289-290、482-483。

³¹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今後反攻復國方策（二）〉統一用兵思想，頁9。

持三角形攻擊戰鬥群」的艦隊作戰方式，³² 此與艦隊的基本戰術有所出入，這也代表以陸軍思維指導海軍作戰應屬當時的常態。

「國光計畫」為蔣中正主導下絕對機密的反攻大陸計畫，但因美國的介入、反對等諸項限制因素，轉而發展出空降與兩棲登陸等複雜、且代號多元的計畫與構想。「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蔣中正原計劃於1965年7-9月於海峽集結大軍發動反攻作戰，³³ 卻在同年的「八六海戰」與「烏坵海戰」失利下，浮現出海軍作戰能力的真實問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於1953年7月30日提到「美參、眾兩院就法案第四節加以修正：以不大過美國海軍預備艦隊驅逐艦、數量不超過25艘，授權總統無代價或有代價轉讓與遠東區域任何友邦國家」。³⁴ 這則紀錄的旨趣在於臺灣可以爭取至少24艘驅逐艦。然而，海軍總司令依據反攻大陸政策，並在陸軍思維的主導下，運送部隊至敵人的灘岸成為主要任務，建軍的首要目標則是兩棲登陸型艦艇。³⁵ 但真正擔任作戰、護航與反潛任務的艦艇卻不足。若藉由1967年4月15日《國光演習海軍作戰之研究報告》所提列的艦船數據可以得知，當時的作戰艦艇為36艘，其中14艘為輕型PC型巡邏艇、5艘為由掃雷艦改裝的舊式PCE型巡邏艦，真正的大型作戰艦為DD驅逐艦4艘、DE護航驅逐艦5艘與APD快速人員運輸艦1艘，合計10艘。³⁶ 國防部於1965年檢討「八六海戰」的報告中已經揭示，海軍艦齡老化、火炮攻擊力量不夠等狀況。³⁷ 這些問題從1953年陳誠提

³² 「『海軍如何針對匪軍建軍思想戰略方針及匪俄慣用戰法研求制勝方策』之研究總結報告」（1962年2月14日），〈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52-005。

³³ 黎玉璽於1965年7月23日的日記中提到「總統在陽明山主持作戰會談」、「7、8、9月份於海峽齊引大軍渡海兩棲攻擊」。〈1965年日記〉（1965年7月23日），《黎玉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館藏號：102-01-01-012。

³⁴ 陳誠著，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頁395。

³⁵ 由黎玉璽1965年7月7日、8月27日等日記中可以觀察到，國防部長蔣經國對於海軍的關注重點為LST（兩棲戰車登陸艦）的建造與海昌、武昌隊的運用。〈1965年日記〉（1965年7月7日），《黎玉璽》，館藏號：102-01-01-012。

³⁶ 「國光演習海軍作戰研究」（1967年4月15日），〈軍事——美國作戰計畫作為程序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202-00160-003。

³⁷ 「『國防部對八六海戰經驗教訓辦理情形報告書審查之意見』列管案件檢討報告」（1968年1月），〈八六海戰管制案件〉，《國軍史政檔案》，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藏，檔號：

到爭取驅逐艦，經過十多年的時間，並未有明顯的改善。

有關國光計畫的口述歷史指出，兩棲登陸作戰並非僅於灘頭出現登陸部隊，運送的過程中甚為重要。³⁸ 其主要說明，戰鬥力堅強的登陸部隊與龐大的後勤輜重需由艦船運輸，在航運的過程中，脆弱的船團更需要護航艦與空中武力的防護。蔣中正在1965年1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作戰會談研討「虎嘯計畫」，決定改由金門、澎湖兩地為先頭部隊。³⁹ 然而，澎湖的陸上部隊在航運時，護航兵力是否列入考量，從日記上並未顯示。但他在同年2月3日的日記提出「對東海艦隊南下至東引、馬祖攻擊時，我主力艦隊如何處置」、「匪南北艦隊直攻我臺灣本島或澎湖時如何處置」、「對匪潛艇在海峽南北二區防潛之方針」等問題。⁴⁰ 倘若實際執行「虎嘯計畫」，就當時大型的作戰艦艇編制約計10艘（還未計算依年度計畫大修或定保的艦艇），由兩棲艦艇或商船艙裝載運登陸部隊的船團，在護航艦艇可能因多重任務無法兼顧或兵力不足下，渡海期間遭受攻擊之風險將倍增，其結果可能為登陸部隊官兵尚未抵達戰場，就已在海上犧牲。

1962年4月10日陳誠與來訪的胡璉（1907-1977）談到軍政高階幹部情形，提到「均有五日京兆」、「一切奉命行事，不敢有任何主張，執行者是下級，行得通與否，均不負責」等負面觀感。⁴¹ 顯示國府軍政高階菁英，對於元首的反攻大陸指導可能多以應付的態度來面對。黎玉璽（1914-2003）是蔣中正長期以來重點關注與栽培的海軍將領，從日記中觀察，包含記錄何時受訓、何時接掌重要職務等，顯示出對此人寄望之大。⁴² 惟通過黎玉璽對蔣中正有關海軍的建議或報告，並

56_0540_8000_1_700043088。

³⁸ 彭大年等採訪，《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頁243-248。

³⁹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5》（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65年1月7日，頁18。

⁴⁰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5》，1965年2月3日，頁44-45。

⁴¹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2015年），1962年4月10日，頁1522。

⁴² 蔣中正日記對黎玉璽的紀錄概述如下：1949年年度雜錄：詳細記錄黎玉璽的字、省籍、學歷與經歷（餘大多是名字、單位等）。1954年5月2日「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8、黎玉璽入國防大學」。1955年3月6日「黎專任艦隊司令，曹仲周為副總司令」。1957年3月23日「兩

未展現出在建軍上有大幅改善之情。蘇聖雄指出，蔣經國早就介入軍中人事，黎玉璽接掌總司令、參謀總長等重要軍職，均可能與蔣經國有關。⁴³ 相較於陳誠與胡璉言談的軍政高階幹部「五日京兆」之情，黎玉璽應屬於較受兩蔣信任之高階將領之一，他所提出的兵推方案或許更能讓蔣中正滿意。例如，1962年12月海軍總部向蔣中正提報「海蛟一號」計畫的兵棋推演，立案假定為「我海、空軍已能獲得並保持臺灣海峽及目標區海、空優勢」、「運輸艦船能供應本作戰之需」等項目。⁴⁴ 這兩項立案假定，就是國軍當時無法克服且潛存的真實問題，在兵推或演習計畫的設計上或許可以順利推行，但並不代表參戰的軍隊可以實際迴避這些因素而完成任務。然而，蔣中正則道出「高級將領中之實與誠，玉璽為第一也。」⁴⁵

蔣中正在軍事強人的自我認知下，無法接受非他認同的作戰思維，更何況是三軍之中他最陌生的海軍建軍與艦隊作戰。他對於馬漢海權理論的喜好，應屬於馬漢以地緣戰略的概念來描述海軍作戰，如「達成兵力集中的方式」、「構成戰略位置的條件」、「前進基地的強度與資源」，以及「交通線的維護」等通則性的論述。⁴⁶ 可惜的是，蔣中正並沒有將馬漢理論化為實際用途來指導與建構海軍。他親自精選接掌海軍總司令的人才，從陸軍的桂永清到馬尾海軍系統的梁序昭，都不被其認同或信賴。黎玉璽是他千挑百選的海軍總司令接班人，但由大型

棲聯合特遣部隊司令官黎玉璽。登陸軍最高指揮官周至柔或彭孟緝，以周較宜」。1959年2月「上月反省錄。茲舉重要工作如左：甲、海軍總司令以黎易梁是乃十五年來準建海軍人事之第一目標，今始實現也」。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頁424-425；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4》，頁127；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5》（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頁70；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7》（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頁83；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9》，頁62。

⁴³ 蘇聖雄，〈蔣經國在臺軍事權力的建立：以與王叔銘交往為中心的探討（1950-1965）〉，《臺灣史研究》第31卷第4期（2024年12月），頁160。

⁴⁴ 「六四聯合兩棲登陸部隊海蛟一號計畫兵棋推演簡報」（1962年12月），〈軍事——海蛟第一第五十二號及海馬第一號等作戰計畫概要〉，《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2-00063-005。

⁴⁵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4》（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64年2月9日，頁45。

⁴⁶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楊珍譯，《海軍戰略論》（臺北：三軍大學，1954年），頁49、85-87、123。

作戰、反潛等相關艦艇的建軍數量變化上觀察，其並未發揮實質的功能。若再檢視1962年2月14日海軍提出「三角形攻擊戰鬥群」艦隊作戰的報告，提報人雖為海軍副總司令曹仲周（1909-1995），時任總司令者即為黎玉璽，顯示出流於附和之勢。就在艦隊專業領域未受重視、重要將領無法發揮實際影響力之下，海軍成為陸軍的附屬部隊。因此，海軍將更多的心思用於協助執行特種作戰任務，卻意外造就臺灣第一支潛艇部隊的誕生。

叁、從特種作戰任務發展的潛艇部隊

蔣中正對於海軍的建軍與能力未能完整的理解，這樣的結果演變成海軍為陸軍的附屬部隊。他更以陸軍思維推出以島制陸的構想，將大量的軍隊運送到金門、馬祖等外島，藉縮短與減少船舶航行等限制因素，就近跨過鄰近水域執行反攻作戰；此外，又發展出特種部隊以外島為前進基地，遂行各式特攻作戰任務。

海軍依照反攻大陸政策建軍，發展出特種部隊「水中爆破隊」。在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直接掌控之下，成為執行特種任務的一環。⁴⁷這支部隊深受蔣中正重視，他曾於1956年親赴左營視導演習，海軍派遣甫自美國完成水中爆破班訓練的黃種雄中尉負責簡報。黃種雄口述歷史中揭示，蔣中正在巡視爆破隊期間，展現出難得的「露齒笑容」。⁴⁸「如何滲透至大陸實施特攻」，成為特種作戰的核心工作。在這個核心工作下，發展出由蛙人騎乘潛艇的「海昌隊」。隨後，透過向義大利採購的管道，又獲得另一型SX-404袖珍潛艇。戰後臺灣首次潛艇建軍計畫下的「武昌艇隊」，就在意外中誕生。然而，這個計畫的設計，學員的訓練以特攻作戰為主，所使用的武器亦為特種任務的爆破式雷具，此與實際上正規的潛艇作戰相距甚遠。本節接續探討這三個因特種作戰所需而建構的部隊，梳理建立潛

⁴⁷ 例如：蔣中正於1965年7月14日至海軍總部聽取簡報，就指示由陸軍成功隊與海軍水中爆破隊於各處出海偵察，讓匪處處防備。〈1965年日記〉（1965年7月14日），《黎玉璽》，館藏號：102-01-01-012。

⁴⁸ 〈水中爆破隊種子教官黃種雄〉，收入海軍艦隊指揮部編，《艦隊老蛙的故事》（高雄：海軍艦隊指揮部，2009年），頁21-31。

蔣中正陸軍思維下的海軍建設：以臺灣潛艇部隊的建立為例（1949-1975）

艇部隊的經過與彼此的關聯性（海軍艦隊特種作戰部隊相互關聯表如表1）。

表1、海軍艦隊特種作戰部隊相互關聯表

項次	單位名稱	成軍與除役時間	重大事項	關聯性
1	水中爆破隊	1954年3月1日至2005年1月1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54年1月海軍派員赴美國受訓成為種子教官。同年3月成立水中爆破隊。 · 1966年6月擴編為水中爆破大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爆破隊員具備兩棲蛙人體格者挑選進入海昌隊。 · 1971年2月海昌隊裁撤，人員併編至水中爆破大隊，成立海昌中隊，1973年4月海昌中隊裁撤。
2	海昌隊	1960年7月16日至1973年4月1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60年駐義大利副武官汪希苓向義大利接洽4艘CT2F型潛爆艇，臺灣依義製潛爆艇再仿製3艘CE2F型潛爆艇，這7艘艇成為海昌隊的基礎。 · 主要執行「國光計畫」、「龍騰計畫」等反攻大陸之特種作戰任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隊員由水中爆破隊、陸戰偵蒐營與陸軍海龍偵察隊合格的蛙人選拔產生。 · 後續攻勢作戰停滯，這支部隊合併至水中爆破大隊後裁撤。 · 透過接洽潛爆艇的管道，1963年10月又向義大利廠商採購2艘袖珍型潛艇。
3	武昌艇隊	1969年10月8日至1973年11月1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63年10月向義大利訂購SX-404型袖珍潛艇2艘，定名為「武昌計畫」。 · 1965年1月第一期潛艇幹訓班開訓。 · 1965年6月開始組裝工程。 · 1969年6月完工，同年10月成軍。1973年11月1日武昌艇除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訓練科目比照水中爆破隊方式進行。 · 培育出第一批潛艇幹部，成為後續執行「水星計畫」，接收2艘茄比級（Guppy II）潛艇的重要人員。

資料來源：金智，《海上長城：戰後中華民國海軍發展史》；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臺北：老戰友工作室，2011年）；鄧熹等編，《老軍艦的故事——薪火相傳、永固海疆》（高雄：海軍艦隊司令部，2001年）；鄧熹等編，《老戰友的故事》（高雄：海軍艦隊司令部，2004年）；曹少滋等編，《老部隊的故事》（臺北：海軍司令部，2005年）；「檢呈海昌隊移交清冊」（1964年9月），〈特勤室海昌隊改隸移交案〉，《國軍史政檔案》，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藏，檔號：53_1920_2454_1_200054944；「海軍總部向總長黎上將簡報武昌艇建造情形」（1966年6月），〈海軍武昌計劃預算案（外購小潛艇）〉，《國軍史政檔案》，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藏，檔號：53_0210.6_3815-2_1_5300035007。

一、水中爆破隊

水中爆破隊為海軍因應兩棲作戰需求，在美軍顧問團建議下，按美軍編制所成立的部隊。這支部隊原本的任務為兩棲船團於登陸敵人灘岸前，從事水下障礙物爆破與清除灘頭障礙等工作，讓後續的人員、車輛與裝備順利登陸。因任務危險性高，人員素質及其訓練超出一般部隊的要求。1954年3月1日成立水中爆破隊時，由美國海軍兩棲部隊巡迴訓練小組（Troop Training Team, T.T.T.）協助訓練。經過美軍嚴格的訓練後，開始擔任登陸灘頭的偵察與水中爆破任務。⁴⁹ 1960年這支部隊開始奉國防部指示執行各類型的特種任務。例如：1963年「東昇作戰」、1964年「金鷹作戰」，其中劉康沸曾率領特攻組員登陸敵人灘岸，完成突擊作戰與滲透偵察等任務，榮獲國軍第十五屆戰鬥英雄。⁵⁰ 此外，因應新建海昌隊的人力需求，提供合格、優秀的蛙人接受更進一步的特種訓練。1966年6月從原本的中隊層級擴編為大隊層級，任務也日趨複雜。隨後因反攻作戰任務逐漸終結，原本的海昌隊併編至水中爆破大隊。

二、海昌隊

國防部於1960年7月16日成立「海昌隊臨時編組」，1961年3月正式成軍，隸屬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1964年9月16日移交給海軍總部。使用的裝備為向義大利訂購的4艘CT2F型潛爆艇（Underwater Vehicle），後續臺灣又仿製3艘CE2F型潛爆艇，合計7艘（海昌隊使用之潛爆艇如圖1）。⁵¹ 部隊主要任務為「對匪實

⁴⁹ 〈我是怎麼「自願」參加了海軍「蛙人」的訓練〉，收入海軍水中爆破隊北區聯誼會編，《三棲蛙人——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成軍51週年紀念專刊》（臺北：北區聯誼會，2005年），頁10-11。

⁵⁰ 「東昇作戰」任務：1963年上級指示派遣兩個突擊小組，駕艇赴西犬島實施偵查，運用佯動誘敵，得知敵艇之部署。獲取情資經查核屬實，參與人員分別獲頒海功獎章或記大功等獎勵。「金鷹作戰」任務：1964年上級指示派遣兩個滲透小組，連續9天前往敵岸實施偵查，並深入勘察登陸腹地之水文及地貌等資料。蒐集情資審核後具有情報價值，參與人員分別獲頒寶鼎勳章及國防部干城獎章等獎勵。〈水中爆破大隊人物專訪——水中爆破大隊大隊長劉康沸〉，收入曹少滋等編，《老部隊的故事》，頁104-107。

⁵¹ 「核定特種軍事情報處成立海昌隊編制」（1961年12月），〈特種情報室編裝案〉，《國

施潛爆攻擊，削弱匪軍有生戰力」，並候令執行「國光計畫」、「龍騰計畫」等反攻作戰任務。單位主官為上校隊長，全隊編制47員。惟因人員招募與訓練不易，至1964年移交給海軍時只有39員。隊址位於高雄柴山及左營桃子園間的「水射堡」，此地原為二戰末期日本特攻震洋艇的基地，駐地極為隱密。蔣中正曾於1960年9月14日及1961年10月28日親自巡視部隊並聽取簡報。⁵²

這支部隊極為隱密，據前海昌隊潛爆官黃正順指出，他們使用的潛爆艇俗稱「人駛魚雷」，可以潛至敵人的艦艇下實施爆破，宛如人員在水下駕駛著魚雷。這種外觀看似魚雷的小潛艇由兩名蛙人操縱，前座負責駕駛，後座負責特攻與貼雷。當抵達目標海域後，由蛙人駕艇順著潮流進入目的地，後座將雷具的強力吸鐵吸於敵人艦艇的艙底，再順著潮流返回。執行任務時，必須要求時間的精確性，難度極高。⁵³前海昌隊中隊長楊秀俊提到，當時出任務前，醫官會發給每個隊員「成仁丸」，若被敵人俘獲，就即刻咬破藥丸犧牲，以防敵人獲得重要情報，亦即要求隊員不成功、便成仁！海昌隊成立後，蔣中正若至西子灣行館，則會安排至隊上慰問官兵，並逐一點名與合影，他非常重視這支部隊。後因美軍獲悉，海昌隊開始遭到限制，隸屬層級亦逐漸降編，最終與水中爆破大隊合併，並奉命裁撤。⁵⁴



圖1：海昌隊使用之潛爆艇

資料來源：曹少滋等編，《老部隊的故事》，頁113。

軍史政檔案》，檔號：49_1931.15_2454_1_700055862。

⁵² 「檢呈海昌隊移交清冊」（1964年9月），〈特勤室海昌隊改隸移交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3_1920_2454_1_200054944。

⁵³ 〈海昌艇隊潛爆官黃正順中尉〉，收入鄧熹等編，《老戰友的故事》，頁26-27。

⁵⁴ 〈海昌中隊中隊長楊秀俊〉，收入海軍艦隊指揮部編，《艦隊老蛙的故事》，頁73-78。

三、武昌計畫

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前，國防部開始關注微型潛艇。時任參謀總長的王叔銘經向蔣中正報告後，奉准向西德採購100噸之微型潛艇2艘，並交由賴名湯負責辦理。⁵⁵ 透過西德聯絡員韋曜琪聯繫，雙方討論如下：⁵⁶

西德可以協助製造、密運小潛艇，以及人員訓練。

惟應先讓美國知悉，以免造成其反感。

建議避免用潛艇之名詞以減少美軍之顧慮，雷具等武器待訂購運達後再裝配。

上述討論可以得知此為國防部的建案，且必須先考量美軍的觀感；惟美軍對於提供攻勢作戰類型的武器並不支持。

就在接洽CT2F型潛爆艇的契機下，國防部特情室透過海昌隊義大利籍顧問「安東尼」⁵⁷ 獲得微型潛艇的資訊，遂向義大利COSMOS工廠洽談採購SX-404型潛艇2艘。這型潛艇案定名為SX-404型，其意為S代表潛艇、X代表非正式或實驗的載具，404代表40噸、4人操作。雙方於1963年10月27日簽約，定名為「武昌計畫」。按契約規範，全案應於1965年9月7日完工，同年12月底完成訓練。⁵⁸ 1964年6月交由海軍執行，1965年1月潛艇幹部訓練班開訓，基本訓練科目比照爆破隊訓練方式進行，包含蛙人操、海灘長距離跑步、搏擊擒拿、爆破訓練等。同年6月

⁵⁵ 王叔銘日記於1958年5月25日提到「小型潛艇對中國海軍亟為重要，美國不軍援宜向德方購置，魚雷亦為重要軍品，亦宜由西德購之」等。〈1958年日記〉（1958年5月25日），《王叔銘》，館藏號：063-01-01-018。

⁵⁶ 「王叔銘呈蔣中正訂購西德小型潛艇交涉結果」（1958年10月），〈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2-00051-002。

⁵⁷ 檢視〈海軍武昌計畫預算案（外購小潛艇）〉等國軍史政檔案，「安東尼」沒有外文名字紀錄。武昌艇隊艇隊長關振清提出，販賣CT2F型潛爆艇的義大利廠商「普西瑞尼」與「安東尼」是同一個人，但究竟哪個是化名或兩個都是他的名字，無法確認。參見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28-30。

⁵⁸ 「海軍總部向總長黎上將簡報武昌艇建造情形」（1966年6月），〈海軍武昌計劃預算案（外購小潛艇）〉，《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3_0210.6_3815-2_1_5300035007。

成立武昌艇隊，隨即移駐淡水基地展開組裝工程。⁵⁹

由於建造過程沒有完整的設計藍圖，所需之材料來源複雜，且經常送達延遲或品項錯誤，整個工程在「邊試邊作」下進行。義大利COSMOS工廠的代表安東尼更要求加價，並提出「若無法加價，寧願解除契約、賠款違約金，但國軍必須退還所有設備」等意見。藉由海軍總部「武昌艇建造情形及安氏要求加價分析」報告中揭示，全案從1963年核定，原支用預算為新臺幣三千六百一十萬餘元，至1966年預算已增為新臺幣四千零九十六萬餘元。⁶⁰ 鑑於建造工程嚴重延宕，1967年4月22日兩艇移至左營，由海軍第一造船廠繼續建造，至1969年6月底建造完成。⁶¹ 1969年7月1日至9月30日實施3個月成軍訓練。因專業知識、師資教材的不足，以及艇體結構特殊（例如：電瓶充電必須於岸置設施輔助下實施）等因素，3個月的成軍訓練與裝備測試，多在港內操作靜態下潛、蛙人艙水下出入等項目，真正出海潛航訓練其實有限。同年10月8日武昌艇隊正式成軍，由海軍總司令馮啟聰上將主持，分別命名為海蛟號（S-1）（海蛟號〔S-1〕潛艇如圖2）、海龍號（S-2）。典禮後馮總司令登上咸陽艦（DD-16）出航檢閱潛艇操演，「武昌計畫」在形式上劃下句點。⁶²

前武昌艇隊艇隊長關振清提到，海軍第一期潛艇幹部訓練班於1965年元月開訓。同年6月移駐淡水基地時，由於義大利廠商並沒有完整的建造概念與計畫，更無細部的設計藍圖與測試驗證等能力，所以建造過程中經常變更設計。來臺協助建造的義大利人，僅有一位曾為潛艇輪機官的Bruno先生，其餘尚無潛艇資歷。⁶³ 1967年4月22日兩艇移至左營完成後續建造工作，1969年5月完工後進行各項性能測試。為期四年又四個月的建造與訓練過程終於在1969年10月成軍，惟在1973年11月1日便安排兩艇除役，正式服勤的時間只有四年又一個月。

⁵⁹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32-42。

⁶⁰ 「海軍總部向總長黎上將簡報武昌艇建造情形」（1966年6月），〈海軍武昌計劃預算案（外購小潛艇）〉，《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3_0210.6_3815-2_1_5300035007。

⁶¹ 金智，《海上長城：戰後中華民國海軍發展史》，頁263。

⁶² 鄧熹等編，《老軍艦的故事——薪火相傳、永固海疆》，頁194。

⁶³ 鄧熹等編，《老戰友的故事》，頁3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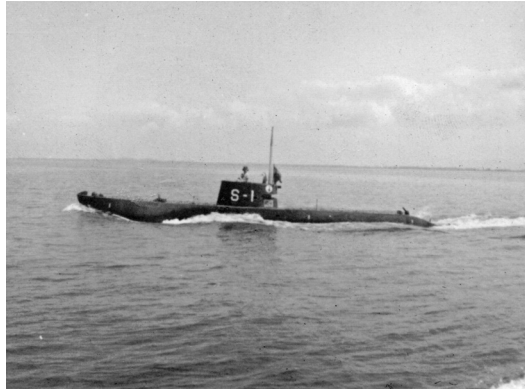


圖2：海蛟號（S-1）潛艇

資料來源：鄧熹等編，《老軍艦的故事——薪火相傳、永固海疆》，頁194。

本節三支部隊中，最讓蔣中正重視且曾親臨視導的是水中爆破隊與海昌隊。這兩支部隊是特種任務的「利刃」，更為反攻大陸攻勢作戰的「矛頭」。前曾述及，因美國的政策導向，臺灣想要建構屬於自己的潛艇部隊非屬易事，造就出必須尋求隱密的管道來獲得。因此，SX-404潛艇的建案，可以視為國府遷臺後海軍建軍史上的一大突破。惟此過程中，由於國軍完全缺乏潛艇建造的基本概念，執行期程從1963年-1969年，時間長達6年，讓國防部長蔣經國都親自前來關切，留下蔣中正都未曾擁有的臺灣潛艇部隊視導影像。⁶⁴再者，國軍缺乏潛艇購案的監造與履約等專業人員，工程又必須在極度保密的環境下進行，以致延伸出承辦人員涉嫌貪污罪等司法案件，包含艦政署計畫組組長葉壽淦、武昌艇隊毛合璞等人移送法辦。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第三處的調查報告中揭示，原契約中訂定「第一艘潛艇由義大利建造、第二艘潛艇由義方派遣技術人員指導海軍裝配」，事實上兩艇全由海軍指派員工裝配。且依約潛艇浮航最大速率應為11節、實際測試僅有7.7節；潛航最大速率應為6.5節、實際測試只有5.5節。最重要的下潛能力，其紀錄為「離碼頭約10公尺緩慢下潛，潛深2-3公尺即予浮起，極不平穩，僅此一動作使用時間近1小時」。除不符合約規範，其耗費鉅額經費，實為浪費公帑。⁶⁵

⁶⁴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52、82-83。

⁶⁵ 「葉壽淦、毛合璞等辦理採購武昌艇案涉有貪污等嫌疑一案」（1970年3月），〈違法事

在建造的過程中，第一期的潛艇幹部也同步展開訓練，惟這群學員學習的是蛙人特攻課程，目的還是駕駛潛艇滲透至敵人的岸邊實施爆破等任務，而不是正規潛艇之水下伏擊戰術，或是聲納、魚雷等武器系統的專業知識。兩艘武昌艇於1969年5月完工、10月成軍，1973年11月即除役，值勤的時間還未達建造與訓練的時間。這四年又一個月的服役時間，主要任務仍為水下爆破與敵情偵查。然而，此時反攻大陸的攻勢作戰已經轉變，潛艇特攻的功能已逐漸逝去。海軍亦曾思考由兩艘武昌艇擔任驅逐艦反潛訓練的水下假想敵，但由於設備簡陋、下潛深度有限，且水中通話距離受限，這種盲目操演對武昌艇隊而言風險甚鉅，雖然搭配過數次，但效果有限。⁶⁶ 這個不甚完善的「武昌計畫」，在海軍建軍史上卻占有相當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培育出第一批潛艇幹部。如擔任中華民國第一艘常規潛艇：海獅號艦長的關振清，以及後來亦成為海獅號艦長、潛水艦戰隊長的李傑（1940-）等人。這批人員是潛艇部隊的第一群種籽，他們將成為後續執行「水星計畫」、接收茄比級（Guppy II）潛艇的關鍵性人物。

透過本節的梳理與討論，觀察義大利提供的CT2F潛爆艇、SX-404潛艇，以及這群隊員的訓練模式與任務執行，可以得到在蔣中正的思維下，潛艇的主要功能是用來執行特種作戰任務，而不是海軍潛艇戰術中深潛水下、伏擊水面軍艦與商輪，切斷對手海上交通線等戰略考量運用。再者，蔣中正手中成軍的第一支潛艇部隊正好見證反攻政策的轉換，原先支援攻勢作戰的特種任務逐漸終止，在協助防衛作戰擔任反潛假想敵的任務上也無法搭配。

肆、遵循「陸主海從」原則的艦隊實際能力

前曾述及，陸軍思維下建構的海軍，以及因特種作戰需求建構的潛艇部隊兩項結果。本節將由這兩項結果再深入探討當海軍艦隊遵循「陸主海從」的原則後，其實際能力的變化。以下就「艦艇老化與裝備陳舊」、「專案人才培育不

件處理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9_1344.9_3430_3_1300142665。

⁶⁶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126-127。

足」，以及「水下作戰與反潛能力匱乏」三個面向做討論。

一、艦艇老化與裝備陳舊

1960年開始，蔣中正積極指導反攻大陸的各式攻勢計畫，以遂行他多年的願望。計畫內容五花八門，包含運用空降、兩棲突擊，甚至以小艇從外島坑道、多船齊發登陸等方式，目標涵蓋廈門、福建、廣東等地區。⁶⁷ 蔣中正1965年1月指導的「虎嘯計畫」，預定由金門、澎湖兩地的部隊首先實施登陸。實際上，又必須回歸到兩棲船團航行與護衛艦隊的安排。同年2月他又提出若中共潛艇在臺灣南北海域伏擊，海軍兵力該如何分配的疑慮。然而，高階軍政精英在各項兵推與演習計畫中，則會以「我海、空軍已獲得臺灣海峽及目標區海、空優勢」等立案假定迴避現存問題，讓蔣中正主持兵推時能夠順利進行，而不致遭到中斷或責難等使會場難堪等情況發生。在「視而不見」下，終於爆發堪稱國府遷臺以來最慘痛的海戰失利：1965年「八六海戰」與「烏坵海戰」。兩次海戰總計損失3艘軍艦，或許對整體反攻大陸部隊的實際作戰能力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但卻是給蔣中正一次沉重的警告。海峽對岸的中共海軍，已經發展出一套可以挑戰國府攻勢作戰的近岸防禦體系。⁶⁸ 時任參謀總長的黎玉璽，在其日記中更揭示海峽的形勢已大幅改變，雙方海軍實力的消長從此轉換等語。⁶⁹ 這兩場海戰失利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陸軍上將唐守智（1906-1975）對海軍實施專案調查，調查報告中指出「海軍當前的嚴重問題」：⁷⁰

⁶⁷ 柴漢熙，《強人眼下的軍隊：1949年後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復國夢與強軍之路》，頁118、238-241。

⁶⁸ 五十嵐隆幸著，林佩欣譯，《反攻大陸與臺灣：中華民國統一的構想與挫折》，頁181-185。

⁶⁹ 黎玉璽於1965年11月14日日記中提到「在五一及八六兩次海戰之今日，顯示出重大意義，或顯示海峽形勢的大轉變，今後任務將益艱鉅」。〈1965年日記〉（1965年11月14日），《黎玉璽》，館藏號：102-01-01-012。

⁷⁰ 「唐守治簽報烏坵海戰調查經過並呈該項調查檢討報告另誤航事件之例五一海戰八六海戰烏坵海戰等資料」（1965年12月3日），〈專案計畫——巨光計畫U2機偵照任務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031-004。

遭遇的船被打，其他船上不去（無法支援），結果官兵被俘。

我們靠美援，艦齡太老、速度太慢、裝備太舊。

對於所有戰術戰略方面，一成不變，所有演習都嫌太假，太戲劇化，兵棋演習，不是實際的，也非理論的，實際缺點不去解決，實際問題不願提出，因此現代的海軍，只等於商船，不像是個有希望的軍種。

上述的內容，可以清楚瞭解1950年-1965年間，海軍的建軍與訓練的驗證結果。在建軍上，兵力老化，裝備也已陳舊。在戰略、戰術上，沒有因應敵情發展而與時俱進。在演習與兵推上，多屬造假或應付上級了事，即使有問題也可能因明哲保身，不願去凸顯或提出。最後提到海軍淪為商船的說法，應屬於刻意鄙視的說詞。但會造成這樣的「果」，可以回溯到前述的「因」，也就是在陸軍思維下所建構的海軍，艦隊並沒有依據實際需求與敵情發展，建立合適的兵力結構。由於兵力不足，老舊艦艇就必須繼續服勤。在面對演習時，則將「無法克服的真實問題」立為假定事項，如此遵循數年，艦隊的戰力自然快速下墜。當1965年海戰失利後，蔣中正的反攻大陸攻勢作為開始停滯，到了1969年轉變為攻守合一，建軍備戰的方向，也由「以攻為主」修訂為「以防為主」，對於防衛部署的需求，則逐年加重建軍的比重。⁷¹

二、專案人才培育不足

舉凡各種形式作戰的成敗，後勤補保均具有其關鍵性。所以，三軍都會有「後勤為先」的思維。海軍艦艇的系統與裝備更需具備專業的後勤維護，才能使其戰鬥力保持不墜。一般水面艦艇已是如此要求，更何況技術層面更高的潛艇。在「武昌計畫」的討論中，已提到建案弊端與浪費公帑等問題。本節藉由該項計畫的履約過程，再深入探討國軍對於潛艇專案，在後勤、採購與監辦人員上的問題。

⁷¹ 五十嵐隆幸著，林佩欣譯，《反攻大陸與臺灣：中華民國統一的構想與挫折》，頁224-226。另參見：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6年），頁90-91。

「武昌計畫」專案於1963年10月17日雙方簽約，除前述提到，全案沒有施工藍圖、邊試邊作之外，在商情分析上，國軍的採購人員亦無事先完成市場調查。這間義大利COSMOS工廠，其實不具備建造潛艇的能力，僅屬於販賣與製造潛水器材的小公司，且製造潛艇的合格技術人員可能只有一位，也就是曾任潛艇輪機官的Bruno先生。後續潛艇因無法按進度完成各階段的組裝工程，廠方代表安東尼卻表示：「建造時間不足，需要提升工作熱誠，因此要求加價」。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由海軍呈給國防部的報告書中揭示，合約本身並沒有法律上的任何拘束力。此顯示出，國軍連糾正施工細節的能力都不具備，更何況是因對方已經違約，應該嚴格要求罰款或解約等處分。最終，海軍還是建議依照義大利廠商的意見同意加價，雙方簽訂補充合約再追加20萬美金。⁷²

除了上述沒有事先調查國外廠商履約能力等問題外，國軍各階層的承辦人員品德查核亦為一大漏洞。海軍總部艦政署計畫組葉壽淦組長奉命赴義大利訂約與監造，由於預算尚有剩餘，後續又與義方簽訂數個裝備合約。惟其中如聽音器、測深儀等裝備重複訂約（主合約已有相同裝備），總計多支付美金4萬1620元，各項合約缺乏保證，有利於廠商。且主合約僅有總價的描述，缺乏各項細目的單價分析，以此訂約，實屬含糊籠統。再者，承辦人員尚有接受義大利廠商招待，以及假造收據報銷等違反採購人員行為規範等情事。甚至葉壽淦於1965年自義大利返國後，即於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5巷購置房屋一棟，其妻顏氏先後在第一銀行等金融機構開戶，與義大利廠商安東尼共同於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設立「泰克公司」，由顏氏任經理、安東尼為總經理，共同營商圖利。惟因申請營業登記不符規定未准，隨即解散，公司電話移至葉壽淦家中使用。⁷³

最嚴重的是裝備採購問題。採購的料配件來自世界各地，新舊什品拼湊。甚

⁷²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66-67；「海軍總部向總長黎上將簡報武昌艇建造情形」（1966年6月），〈海軍武昌計劃預算案（外購小潛艇）〉，《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3_0210.6_3815-2_1_5300035007。

⁷³ 「海軍總部採購武昌艇案」（1969年12月），〈違法事件處理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9_1344.9_3430_3_1200142664；「葉壽淦、毛合璞等辦理採購武昌艇案涉有貪污等嫌疑一案」（1970年3月），〈違法事件處理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9_1344.9_3430_3_1300142665。

至有裝備發現為舊品，除不退款、也不退貨。其中，X光檢查儀於1965年8月自義大利送抵臺灣，即封存淡水基地3年未動，1967年運抵左營第一造船廠開箱時，查悉非新品，且生鏽、缺件無法使用，形同廢品。更離譜的是，執行特攻作戰使用的所有爆破雷具，均為空殼。⁷⁴ 由國防部的調查報告中所示，在整個計畫中，有關造艇材料與規格、裝備廠牌與性能、單價分析、交貨驗收等項，執行單位完全缺乏專案管制的的能力。

從1958年參謀總長王叔銘提出採購微型潛艇構想開始，至1963年與義大利廠商訂約採購SX-404潛艇，前後約有5年時間，這段期間國防部並沒有針對潛艇購案積極培育專案人員。「武昌計畫」原本由國防部特情室負責執行時，就以機密為由，未依規定通知權責單位監辦。海軍接辦後，亦承襲特情室的方式，迴避相關監察作業規定。前述所及，在陸軍思維的主導下，海軍或艦隊作戰演訓的專業領域並不會受到重視，更何況是海軍的採購、工程或履約等後勤能力。雖然，SX-404潛艇是特種作戰使用，但操作規範為下潛至敵方水域後實施特攻作戰與爆破任務，因此需具備潛航的能力，艇殼必須達到抗壓的標準，建造艇殼的材質更有別於一般船舶。加上潛航需要的潛望鏡、聽音器等水下特殊設備，在當時並非由一般商規或航運業可以獲取。若相較空軍與民航業、陸軍與民間輪型車輛在部分技術與料件上的通用性，潛艇的裝備具有其特殊性與專業性，更需要培育專案的人員，才能獲得正確且符合作戰需求的裝備。惟國府與國防部並沒有如此的觀念，亦可能在陸軍思維下，認為特種水下載具的建構並非困難或複雜的工程，就如海昌隊使用的義大利製CT2F型潛爆艇，可以由海軍左營第一造船廠自行仿製出國產的CE2F型潛爆艇，卻不知此兩型艇在結構與規格上有極大的落差。⁷⁵ 此顯示出，受陸軍思維的影響，以及在極度保密的環境下，國軍並沒有積極培養具備專案管制能力的人才，加上執行建案的軍官受到國外廠商的誤導與誘惑，以致耗時6年、投資四千餘萬鉅額，卻獲得沒有實際作戰能力的潛艇。

⁷⁴ 「葉壽淦、毛合璞等辦理採購武昌艇案涉有貪污等嫌疑一案」（1970年3月），〈違法事件處理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59_1344.9_3430_3_1300142665。

⁷⁵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30。

三、水下作戰與反潛能力匱乏

1955年10月蔣中正在與美國第七艦隊司令蒲賴德（Alfred M. Pride, 1897-1988）會談時，即已提到臺灣海軍的攻潛與反潛能力尚待加強等議題。當時，蔣中正僅詢問是否為「聲納」設備的問題，而蒲賴德直接回覆為「中華民國海軍訓練不足」，且反潛訓練需要美軍潛艇協助等因素。⁷⁶ 然而，蔣中正當下卻沒有告知，臺灣其實應該需要屬於自己的潛艇，以協助水面艦的反潛訓練。他沒有在意海軍的建軍需求，除了前述的陸軍思維外，另一部分來自於「他認知下的臺灣海軍實力應該高於對岸的中共」。就如Elleman所提出，戰後國府的海軍實力在1958年前確實高於中共，可以執行關閉政策。相對地，Bussert也提出，對岸的中共並沒有停止海軍建軍的腳步，而是運用蘇聯的潛艇，訓練出可以與國府海軍抗衡的潛艇部隊。

從1961年開始，國府持續獲得中共潛艇跨越海峽的資訊。⁷⁷ 由空軍的偵查報告中，也可以發現中共潛艇發展動態。⁷⁸ 美國站在監督國府的角度上，對於兩岸軍力的消長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1966年1月12日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向國務院報告「1月10日中華民國海軍在臺灣海峽與聲納接觸的潛艇實施深水炸彈攻擊。

⁷⁶ 「蔣中正與美國第七艦隊司令蒲賴德會談資料」（1955年10月7日），〈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十八）〉，《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080-014。

⁷⁷ 有關中共潛艇進入臺灣周邊水域的紀錄，包含1963年時任聯勤總司令的賴名湯於5月3日的日記中提到「匪將於本月1至2日，由潛艇運送蛙人至基隆及安平一帶登陸，以打擊我民心士氣，我海軍特派DD等兵艦在臺灣海峽加強巡邏」。賴名湯著、葉惠芬等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I》，1963年5月3日，頁58。時任總統府侍衛長的胡炳也提出「1963年5月2日晚上，海軍在桃園西北方17海浬處發現中共潛艇，海軍立即發動攻擊」。汪士淳，《飄移的歲月——將軍胡炳大使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頁216。

⁷⁸ 1964年7月U2飛行員王錫爵中校於上海、定海、大榭島一帶發現潛艇9艘。「空軍總司令部呈送王錫爵駕U-2機執行大陸空照任務發現上海定海一帶發現中共潛艇九艘等情報」（1964年7月16日），〈空照判讀——中共沿海港口機場暨軍事設施機艦動態（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4-00026-002。同年11月王錫爵中校又於大連港發現飛彈潛艇。「徐煥昇呈蔣中正報告王錫爵十一月七日駕U-2機執行空照任務在大連港發現飛彈潛艇一艘」（1964年11月14日），〈空照判讀——中共沿海港口機場暨軍事設施機艦動態（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4-00026-004。

據瞭解，聲納接觸深度為198英尺，這超出了中共海軍潛艇可能下潛的深度」。美國對這件攻潛案評列為「可能」，也就是中共潛艇的潛航能力可能已大幅提升。⁷⁹ 中共潛艇開始快速成長，海軍最迫切的需求為實際的反潛作戰能力。然而，此時的反潛實體操演訓練，必須透過美軍派遣潛艇支援。更讓蔣中正感到棘手與困擾的，是中共的潛艇已悄然跨越海峽，進入臺灣周邊水域。這對於國家的整體安全環境而言，無疑是一項必須填補的漏洞。

在面對挑戰中，中華民國海軍的反潛能力又是如何？由黎玉璽於1961年4月呈蔣中正的「海軍兩棲作戰能力之研判」可以窺探出當時的實際情形：⁸⁰

對付匪潛艇之威脅，我使用最大兵力為艦艇22艘，驅逐艦3艘、護航驅逐艦4艘，其中僅驅逐艦兩艘有傳真聲納。

各艦艇不能同時擔任多重的作戰支援任務，如擔任反潛屏衛後，同時有艦砲支援任務以及遭受艦隊攻擊將無法兼顧。

黎玉璽的報告顯示出，海軍除了缺乏水下戰力外，在整體實力上，大型水面作戰艦艇不足，更缺乏具有先進聲納的驅逐艦。若同時在反潛與其他任務重疊之下，艦隊將無法兼顧。然而，在這個報告之後，面對中共潛艇快速發展的情勢，國府與海軍並沒有更多的因應作法。而是如前述，蔣中正又拋出諸項反攻大陸的議題，要求海軍研討與處置。

到了1969年美國提出即將停止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之舉，並暫停派遣潛艇赴臺。面對國際局勢的詭譎多變，臺灣的反潛訓練後續可能將無美軍潛艇的實際協助。前述特種作戰用途的海昌隊與武昌艇隊，是蔣中正對於海軍建構潛艇部隊的基本概念，而不是早在1955年10月他與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會談時，雙方已經討論到反潛能力尚待加強等議題，當時蔣中正並沒有意識到，臺灣其實是需要屬於自己的常規潛艇。

⁷⁹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anuary 12, 1966,” 1020Z.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⁸⁰ 「黎玉璽呈蔣中正海軍兩棲作戰能力之研判」（1961年4月），〈軍事——海軍兩棲作戰能力之研判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2-00117-001。

蔣中正在軍事強人的認知下，無法接受非他認同的作戰思維，加上他以陸軍為主的建軍思想，並且漠視海軍艦隊的實際功能，造就出對岸的敵人已經在寧靜中「侵門踏戶」、直接由水下威脅臺灣周邊水域與海上交通線。這個問題若從 1955 年 10 月與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會談起算，至 1969 年已有十三餘年。若由黎玉璽 1961 年提出的報告起算，至 1969 年也已有 8 年。此時，國府在陸軍思維與特種作戰需求下建構的武昌潛艇，沒有水下潛對潛的作戰能力，亦無法支援水面作戰艦艇反潛訓練的能力，加上美軍即將停止潛艇派遣與協訓，中華民國海軍在制海能力上將受到更大的限制。

歸結所陳，海軍在陸主海從的概念下建軍與發展，造成以下的結果：首先，巡弋海疆的基本巡邏艦艇已快速老化，裝備陳舊且火力不足。1965 年 11 月國防部甚至提出拆裝除役艦艇的火砲，或向陸軍調用機槍等武器，附加於現役艦艇，以強化打擊火力等構想。⁸¹ 然而，自美國接收的各型艦艇，設計時已就所能配賦的武器系統，詳實計算負荷之電力、載重、吃水等相關因素，意指所有的武器系統並非都能任意加改裝，如此將會影響艦艇航速與動力系統的負荷，因此有降低這些艦艇戰場存活率之可能性。其次，海軍人才的培育並沒有與時俱進，尤其針對特殊建案或先進設備的採購等人力上的需求。由於長期受到陸軍思維的影響，並沒有依據建軍願景與艦隊實際需求，培養出學習新式裝備的人才。最後，海軍在裝備與人力兩大層面上均產生問題，其延伸至訓練與應對敵情的能力上，自然會呈現負面的結果。尤其到了 1969 年即將失去美軍潛艇實際的支援與協助，面對技術性複雜的水下作戰與反潛訓練，中華民國海軍之際遇更是雪上加霜。在如此困境中，獲取常規潛艇，成為必須儘速處理的國家安全議題。

伍、國家政策轉變中的常規潛艇建案

1969 年 1 月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就任美國總統，同年

⁸¹ 「八六海戰後海軍研究將若干艦艇上加裝小口徑火砲辦理情形」（1965 年 11 月），〈先勤計劃械彈整備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47_0800.4_2421_16_700045975。

7月美國開始宣傳「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呼籲亞洲國家必須自我承擔防衛責任。⁸² 同年8月3日蔣中正在夫人宋美齡、駐美大使沈劍虹（1908-2007）等人陪同下，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ierce Rogers, 1913-2001）等人晤談有關軍援與防衛的議題，略述如下：⁸³

美國政策並未放棄金門、馬祖。

對於反攻大陸的討論，中華民國目前甚至尚無自衛之能力。若中共獲悉吾人目前防衛虛弱情形，彼等可能因而向我進攻。

中共有米格21型飛機與潛艇隊，可用以切斷臺灣與外島間之海上交通。

從這段華美對話的內容可以看出，中華民國的軍事力量已不足以反攻大陸，國家政策已經逐步轉變為防衛臺、澎、金、馬，維護海上交通線成為當下重要的課題。

戰後臺灣首次潛艇建軍案已有討論，其用途來自特種作戰的需求，實際上無法擔綱真正的水下作戰任務，也無法支援水面艦的反潛訓練。就在國際情勢即將丕變與海峽敵我態勢快速消長下，1969年後國府爭取高性能戰機與常規潛艇，成為華美雙方高層談判的常用關鍵詞（有關戰機的討論，因非本文探討之重點，故不再論述）。蔣中正1970年日記中多次提到自製潛艇的想法，包含請「白團」協助設計與製造，甚至還有「義（大利）小型潛艇推進器應研究仿造大型潛艇之用」等構想。⁸⁴ 從中可以得知，蔣中正對於潛艇需求的急迫性，以及他對於武昌潛艇的實際能力、違約弊案等情或許未全知悉。同時更可以窺探出，蔣中正對於潛艇的認識仍停留在特種作戰概念下的載具，對常規潛艇的構造與性能等，可能並未完整的理解。

⁸² 五十嵐隆幸著，林佩欣譯，《反攻大陸與臺灣：中華民國統一的構想與挫折》，頁231。

⁸³ 「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羅吉斯會談有關越南問題等談話簡要紀錄」（1969年8月3日），〈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七）〉，《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205-00089-003。

⁸⁴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70-1972》（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70年10月3日、1970年12月6日、1970年12月10日，頁174、208-209。

國府向美方爭取常規潛艇，可以追溯至1965年蔣經國剛接任國防部長時。⁸⁵但一直到1969年7月，孔令侃（1916-1992）拋出美國海軍有4艘傳統潛艇將要除役的訊息，使潛艇的建案更具可行性。此期間，蔣經國數次與駐美大使周書楷（1913-1992）商討洽購的數量、方式與經費等內容，但均沒有實際的突破。⁸⁶1969年9月原擔任蔣中正總統府的海軍侍從武官汪希苓（1929-）銜命赴美，由於他於義大利擔任副武官時，曾有協助採購海昌艇與武昌潛艇的經驗，此行的首要工作就是爭取美軍常規潛艇。⁸⁷汪希苓抵達美國後，美國國會對於軍援臺灣潛艇的意見反覆，最後以「中華民國沒有訓練有素的潛艇人員」等理由擱置。⁸⁸海軍的建制單位確實有武昌艇隊這支潛艇部隊，但卻被美方指出臺灣「沒有訓練有術的潛艇人員」。這個「果」可以凸顯出前述的「因」。武昌潛艇是以陸軍思維建構的特種作戰用載具，在裝備、武器、動力系統的操作與訓練上，甚至於修繕工程等領域，都與常規潛艇相距甚遠。或許「武昌計畫」曾培育出第一批忠義、且熱誠的種籽隊員，但與實際上常規潛艇專業、且嚴格的人員簽證機制，實屬天壤之別。⁸⁹

1970年4月，周書楷大使與汪希苓等人敦請佛羅里達州國會眾議員席克斯（Bob Sikes, 1906-1994）於眾議院發言，支持臺灣盡快獲取潛艇。⁹⁰同年7月汪

⁸⁵ 「蔣經國電周書楷關於增加援艦一事探問是否有撥贈潛艇之可能」（1965年8月20日），〈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645-034。

⁸⁶ 聯繫的內容，詳見於1969年7月周書楷與蔣經國往來的電文。「周書楷電蔣經國擬向美方交涉免費租借現潛艇四艘」（1969年7月8日），〈對美關係（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8-311。「蔣經國電周書楷爭取潛艇四艘一案希能以軍用物資售予辦法低價購」（1969年7月21日），〈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646-056。

⁸⁷ 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1999年），頁128。

⁸⁸ 「周書楷電蔣經國訪晤格林說明我對幽靈機及潛艇之需要美方提出我須加強空防系統與反潛裝備」（1970年7月15日），〈對美關係（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8-336。

⁸⁹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249-250。

⁹⁰ 「美國共和黨佛羅里達州國會眾議員席克斯眾議院關於潛艇提供臺灣發言紀錄」（1970年4月10日），〈席克斯（Sikes Bob）往來函件〉，《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

希苓返國向蔣中正述職時，仍以獲得潛艇為談話的重點。⁹¹ 惟蔣中正因受美國與中共頻繁接觸的影響，對其國會沒有好感。因此指示蔣經國與汪希苓不要透過美國議員交涉，與美方所交涉之事務亦不必再催促，任其自動發展。⁹² 但此時蔣中正對於防衛臺、澎、金、馬，提升海軍反潛作戰的能力，則成為他關注與要求的重點工作。1970年7月12日他指示國防部長黃杰（1902-1995）、參謀總長賴名湯、海軍總司令宋長志（1916-2002）：「海軍反潛演習，今後應特別注重，參加演習各艦長，其事前必須對各種機器，尤其聲納與通信設備等，更須注重。以後反潛演習，如有不及格之艦艇，其艦長與主管不及格之業務者，應即撤調。」⁹³ 這項指示無疑是嚴格要求海軍的「軍令」，代表著蔣中正開始對於防禦臺灣周邊水域的關切與重視。

1971年汪希苓改用「提供反潛訓練的目標艦，使中華民國海軍在實際操作下提升水面艦的反潛能力」為說帖，向五角大廈展開遊說，「防衛臺海、訓練反潛」的理由開始獲得美方的認同。2月汪希苓密電蔣經國提到，潛艇案已獲國務院高級人士同意。⁹⁴ 接著，3月周大使提出，經與孔令侃一同向美國國防部長賴德（Melvin Robert Laird, 1922-2016）斡旋，已同意從原提供1艘，改增列為2艘潛艇予中華民國。⁹⁵ 同年8月海軍總部正式啟動潛艇專案「海神計畫」，開始選派赴美官兵。1972年元月潛艇專案「海神計畫」更名為「水星計畫」，接收人員開始前

010502-00621-003。

⁹¹ 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頁130-131。

⁹² 王叔銘1970年12月12日日記提到「汪希苓此次去臺北8天。據汪希苓稱，總統近來脾氣特大，文武官員均心存戒心，總統再三告誡希苓，不要為了向美國政府要東西，去走美國國會議員的路子，以免上當。一旦美方揭破則國家聲譽亦受損且將引起不良後果，以前美方所交涉之事亦不必再催，任其自動發展而已。總統且再向蔣經國告誡希苓，停止過去之行動」。〈1970年日記〉（1970年12月12日），《王叔銘》，館藏號：063-01-01-037。

⁹³ 「蔣中正指示黃杰賴名湯宋長志海軍反潛演習應注重之處」（1970年7月12日），〈籌筆——戡亂時期（三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10400-00036-022。

⁹⁴ 「汪希苓電蔣經國潛艇案據有人告稱已獲國務院高級人士同意」（1971年2月23日），〈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二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668-022；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頁131。

⁹⁵ 「周書楷訪晤賴德部長交涉潛艇事同意予我兩艘」（1971年3月26日），〈對美關係（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8-345。

往美國受訓。⁹⁶

在此過程中，美國內部仍存有不同的討論與意見。例如，1972年4月2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何志立（John Herbert Holdridge, 1924-2001）致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 1923-2023）的備忘錄提到：「這些潛艦僅用於反潛作戰訓練，為何魚雷發射管與其他潛對潛的攻擊設備沒有移除？倘若我們要轉讓這些潛艇，至少可以稱這些潛艇沒有攻擊的能力，從而減少北京的不滿。」⁹⁷ 同年10月6日何志立再次致電季辛吉：「我還是建議，作為轉讓條件，中華民國同意潛艇僅用於反潛訓練，這是雙方唯一的軍事用途。如果臺灣同意，隨後又將潛艇改作其他用途，我們至少紀錄在案，告知不可這麼做。」⁹⁸ 歸結而言，華美雙方在潛艇移交前簽署的備忘錄，已嚴格規範潛艇之用途，排除臺灣自行將攻擊用魚雷裝置於潛艇的權力，為此美方先行移除潛艇上的機密電子裝備，並封存敏感的技术手冊。⁹⁹ 這代表著，此時美方提供兩艘不具攻擊能力的潛艇，僅做為水面艦反潛訓練之用，其目的為不讓臺灣擁有實質的水下戰力。

經過多年的斡旋，美國終於願意將兩艘即將除役的茄比級常規潛艇移交給中華民國。臺灣接收的茄比級潛艇，Guppy為「Greater Underwater Propulsion Project（增進水下推動力方案）」之縮寫，其原為美海軍Fleet type潛艇，二戰後加裝電子裝備、艇體整合成流線型，並增加主電瓶容量，使其能於水下航行的時間更久、速率更快。¹⁰⁰ 第一艘原訂於1972年12月31日移交，第二艘原訂於1973年6月30日移交。然而，首批赴美接收常規潛艇的官兵已準備就緒，可以登艇展開訓

⁹⁶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150、159。

⁹⁷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April 28, 1972.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⁹⁸ “Memorandum From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Washington, October 6, 1972.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⁹⁹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頁128。

¹⁰⁰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147。

練。但因美軍潛艇學校的教學設施有限，課堂階段的訓練將延長至1972年11月底結束，上艇訓練的時間則自11月底開始。因此，第二批官兵抵達的時間也延至11月底。¹⁰¹ 最終，兩艘潛艇接收官兵經過紮實的訓練與合格簽證，前美國海軍USS *Cutlass* (SS-478) 潛艇於1973年4月12日移交給中華民國，命名為海獅號 (SS-91)，戰後臺灣的第一艘常規潛艇正式成軍，1974年4月18日返抵國門。另一艘前為美國海軍USS *Tusk* (SS-426) 潛艇，1973年10月18日移交，命名為海豹號 (SS-92)，1974年1月10日返抵國門。¹⁰²

在專案管制的成效上，海軍執行「水星計畫」相較於「武昌計畫」更顯成長。當確立美海軍移交潛艇的時間，首先於1973年8月成立「潛水艦戰隊臨時編組」，負責管理與支援潛艇部隊等各項事務，下轄的單位包含陸續成軍的海獅號與海豹號、武昌艇隊的海蛟號與海龍號，以及學習美海軍潛艇編制建構的「支援艦」。支援艦具有與潛艇相同的人員編制，包含艦長、副長與輔導長等官兵，建立目的為因應潛艇服勤期間，因人員休假補充完整人力之用，或是潛艇大修人力支援與執行臨時任務等。¹⁰³ 另在後勤維修與教育訓練上，海獅號於1973年4月12日成軍後，為何延至1974年4月18日才返國，相較於海豹號在美國停留的時間更久？主因為駐美武官汪希苓安排海獅號於美國舊金山Hunters Point造船廠實施大修，同時指派左營海軍第一造船廠優秀的技師與後勤軍官一併赴美造船廠學習。由潛艇的維修計畫、料配件籌補、進度管制到品管測試，以及維修實務技術等，從頭到尾全套學習整個潛艇大修的作業過程。¹⁰⁴ 此外，就後續潛艇人員的培訓而言，長久以來海軍並沒有適當的訓練教練設備可供使用，因此由當時海獅號的兵器長李傑少校，督導左營造船廠技師與艇上官兵，組裝由美國拆運來臺的ASKANUA型潛航教練儀，對於後續潛艇官兵的教育訓練功不可沒。¹⁰⁵

¹⁰¹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anuary 12, 1966,” *1020Z.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¹⁰²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280、297。

¹⁰³ 「成立潛水艦戰隊正式編制及潛水艦支援隊案」（1973年7月），〈艦艇編裝案〉，《國軍史政檔案》，檔號：62_1934.1_2841_2_1900057096。

¹⁰⁴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頁220-221。

¹⁰⁵ 海軍艦隊司令部編，《碧海丹心忠義情——海軍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高雄：海軍艦隊司令部，2005年），頁171。

1974年時任參謀總長的賴名湯在1月12日日記中提到「今天在左營登上中國史上第一艘海豹號潛艇，有10具魚雷發射管，但都沒有魚雷」。¹⁰⁶ 前國防部長、海軍總司令伍世文（1932-）曾指出：「美軍售予臺灣的兩艘潛艇海獅與海豹，交艦前魚雷發射管均已封閉，魚雷發射系統亦未加檢修整備，致無攻擊能力。」¹⁰⁷ 然而，1975年1月華府國安高層獲得「臺北正透過某特殊管道向美軍火掮客採購三十枚MK-37型魚雷」的情資，這批魚雷是軍火商以非法手段，從紐約布魯克林軍港竊盜而來，國府試圖以每枚75,000美元的價格採購，以供茄比級潛艇使用。季辛吉立即訓令美國駐臺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 1917-2010）向蔣經國交涉，並採取補救措施，以免傷害華美關係。蔣經國聽聞後強調這絕非國府當局行事原則，並表示自己對此案毫無所悉。經海軍的解釋與澄清，華府認為毫無說服力，且高度懷疑宋長志即是幕後的主使者。最終，駐美海軍武官邱華谷少將得知對方的幕後操盤手為黑道，30枚魚雷是竊自美海軍基地的贓貨。除終止採購案，邱華谷因涉入「不當行舉」而結束駐美職務。¹⁰⁸ 經觀察這起盜買美國海軍魚雷贓貨的歷程，更能證明美國嚴格的監督與控管機制，使臺灣的兩艘茄比級潛艇，必須完全做為訓練反潛之假想敵使用。

此外，在這個建案中，蔣中正因對孔家的排斥，曾要求蔣經國防止孔令侃的介入。¹⁰⁹ 但由大使館來往總統府的電文觀察，美方最終同意提供由原始的一艘增加為兩艘潛艇，孔令侃的談判手腕對此案還是有所貢獻。歸結而言，經過大使館、駐美武官與非正式管道（孔家）的共同努力，蔣中正終於獲得兩艘常規潛艇，建立第二支潛艇部隊。這兩艘茄比級潛艇，原屬美軍攻擊用的潛艇、水下作戰的利器，經過斡旋與妥協後沒有了實質作戰能力，僅屬防衛臺海反潛訓練的一項設備，成為「沒有牙齒的鯊魚」。這個過程中，可以藉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¹⁰⁶ 賴名湯著，葉惠芬等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III》（臺北：國史館，2017年），1973年1月12日，頁289。

¹⁰⁷ 張力，《伍世文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7年），頁215。

¹⁰⁸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頁128-131。

¹⁰⁹ 蔣中正對於孔令侃「鹵莽奔放、自是行動」感到憂心，指示蔣經國制止其參與潛艇援華的提案。呂芳上等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2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681。

與季辛吉間的電文得知，尼克森時期的美國在處理臺海的事務上，考量中共的觀感而審時度勢，已成為必要的作業程序，而不是艾森豪時期，國府在取得軍備資源上有較大的發言權。然而，當時並沒有將此當成國防軍備爭取的重點，誠屬可惜。

從1969年-1974年華、美雙方久經斡旋，始取得兩艘茄比級潛艇，宛如臺灣當時所面對的國際局勢，必須妥協與接受取捨。若就國家政策而言，蔣中正的第二支潛艇部隊，原本是攻勢的武器，但轉變為強化反潛、防禦敵人侵入的訓練設備，正好見證由攻勢作戰轉換為防禦臺灣的階段。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蔣中正，或許仍存有反攻大陸的執念，但也逐步將防衛臺灣轉為其餘生的重點，對海軍的關切亦開始有些許的改變，指導艦隊實務也較過往更顯細緻與具體，尤其反潛訓練與艦隊測考機制等層面。但他的生命逐漸走向尾聲，1974年兩艘潛艇分別從美國回到臺灣，蔣中正無法前往視導，直到隔年過世，他沒有親眼看到兩艘常規潛艇。但這兩艘潛艇的建軍歷程，卻見證蔣中正時代國家政策的轉變。

陸、結論

本文藉由文獻探討與檔案梳理，論證蔣中正自1949年內戰失敗來到臺灣後，仍以大陸時期的陸軍思維，來看待臺灣這個海島型國土的國防安全。本文也討論到，在反攻大陸的執念下，建構海軍仍屬橫渡海峽採取攻勢的首選。惟蔣中正以陸軍的觀點，發展出以島制陸、特種作戰等作戰模式。可惜的是，對岸的敵人並沒有給他測試這些方式充分的時間，而是發展出另類的對抗作為，利用潛艇、快艇等裝備，建構出近岸防禦的體系。

在陸軍思維下所建構的海軍並沒有完善與充足的作戰艦艇，面對敵人快速的進步，1965年的兩次海戰失利等同向國府敲響了警鐘。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的檢討報告，耿直地提出「軍艦老舊、戰術與演習太假」等實際問題。然而，報告中所述的這些現象，並非一朝一夕可以生成，而是經年累月堆積的結果。這也提醒了蔣中正，在他自詡的軍事才能下，卻建構出如此的海軍，他的反攻大業應該要先停滯並且重新思考。

透過華、美各式的情報得知，1960年代敵人的潛艇開始在寧靜中穿越海峽。此時，原先在陸軍思維下，由特種作戰中發展出來的武昌潛艇，作為反潛訓練的假想敵都有困難，更何況是與敵人於水下對弈。當即將失去美國反潛訓練的援助，國府必須想方設法尋求常規潛艇以解決困境。經過多方爭取與斡旋，在蔣中正生命即將走入尾聲時，兩艘「沒有牙齒的鯊魚」終於抵達臺灣。

蔣中正所建構的第一、二支潛艇部隊，正好成為由攻勢作戰轉變為防衛臺灣的見證。第一組武昌潛艇，為1963年反攻大陸白熱化時提出的建案，主要功能為特種作戰的水中載具。1969年完工時，國家政策已由攻勢作戰轉變為攻守一體、以防衛為主。其在「耗費多時」、「徒勞無功」下除役，此與蔣中正在1960年代的反攻大陸政策正好形成一種對照。第二組茄比級潛艇，在美海軍1973年除役移交臺灣前，原為水下作戰的利器。但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爭取與斡旋的時間受到限制。經過妥協與取捨，最終水下利器成為沒有攻擊力量的訓練器材，此與蔣中正在1970年代防衛臺灣的情境亦形成另一種對照。

最後，爬梳島嶼型國土的英國或日本近代史，會發現在四面臨海的環境中，評估風險與應對威脅，優先思考的會是建構海上防衛力量。然而，蔣中正在臺主政期間，中華民國國防安全體系的建構，深受陸軍為核心的思維所主導，整體規劃集中於反攻大陸的陸上作戰，此一戰略取向導引出軍種發展的優先次序。就安全環境而言，前瞻性部署多倚賴外島防衛，以及美國提供的「保護傘」，而非強化自身海軍力量以提升周邊海域的防禦能力。此種觀念，在戰略思維上則呈現出結構性的局限。當偏差持續累積，對國家安全將產生深層的影響。或許可以說，這部分也形塑出臺灣海軍的現代型態。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陳誠題詞彙存〉。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二十一）〉。
〈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七）〉。
〈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八）〉。
〈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八）〉。
〈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九）〉。
〈對美關係（七）〉。
〈籌筆——戡亂時期（三十六）〉。
-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二十七）〉。
〈外交——蔣中正接見美方代表談話紀錄（十八）〉。
〈空照判讀——中共沿海港口機場暨軍事設施機艦動態（一）〉。
〈軍事——美國作戰計畫作為程序等〉。
〈軍事——海軍兩棲作戰能力之研判等〉。
〈軍事——海蛟第一第五十二號及海馬第一號等作戰計畫概要〉。
〈席克斯（Sikes Bob）往來函件〉。
〈專案計畫——巨光計畫U2機偵照任務等〉。
- 《國軍史政檔案》（臺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藏）
〈八六海戰管制案件〉。
〈先勤計劃械彈整備案〉。
〈海軍武昌計劃預算案（外購小潛艇）〉。
〈特勤室海昌隊改隸移交案〉。
〈特種情報室編裝案〉。
〈違法事件處理案〉。
〈艦艇編裝案〉。
- 《王叔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1958年日記〉。

〈1959年日記〉。

〈1970年日記〉。

《黎玉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1965年日記〉。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二、年譜、史料彙編、日記

呂芳上等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2冊。臺北：國史館，2015年。

張力等編，《海軍艦隊發展史（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臺北：國史館，2015年。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1954年。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3年。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8-1972年。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4年。

賴名湯著，葉惠芬等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 I》。臺北：國史館，2016年。

賴名湯著，葉惠芬等編輯校訂，《賴名湯日記 III》。臺北：國史館，2017年。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汪士淳，《忠與過——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臺北：天下遠見出版社，1999年。

汪士淳，《飄移的歲月——將軍胡忻大使的戰爭紀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年。

海軍艦隊司令部編，《碧海丹心忠義情——海軍六二特遣部隊的故事》。高雄：海軍艦隊司令部，2005年。

- 海軍艦隊指揮部編，《艦隊老蛙的故事》。高雄：海軍艦隊指揮部，2009年。
- 海軍水中爆破隊北區聯誼會編，《三棲蛙人——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成軍51週年紀念專刊》。臺北：海軍水中爆破隊北區聯誼會，2005年。
- 陳誠著，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年。
- 張力，《伍世文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7年。
- 曹少滋等，《老部隊的故事》。臺北：海軍司令部，2005年。
- 彭大年等採訪，《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年。
- 鄧熹等編，《老軍艦的故事——薪火相傳、永固海疆》。高雄：海軍艦隊司令部，2001年。
- 鄧熹等編，《老戰友的故事》。高雄：海軍艦隊司令部，2003年。
- 關振清，《下潛！下潛！中華民國海軍潛艦部隊之創建》。臺北：老戰友工作室，2011年。

四、專書

- 五十嵐隆幸著，林佩欣譯，《反攻大陸與臺灣：中華民國統一的構想與挫折》。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5年。
- 林孝庭，《臺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臺灣史1948-1988》。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年。
- 林孝庭，《蔣經國的臺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臺灣》。新北：遠足文化，2021年。
- 金智，《海上長城：戰後中華民國海軍發展史》。臺北：獨立作家，2025年。
-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著，楊珍譯，《海軍戰略論》。臺北：三軍大學，1954年。
- 國防部「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95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06年。
- 柴漢熙，《強人眼下的軍隊：1949年後蔣中正反攻大陸的復國夢與強軍之路》。臺北：黎明文化，2020年。
- 黎玉璽，《八二三金門會戰海軍作戰實錄》。臺北：著者自印，1985年。

- Bussert, C. James C. & Elleman A. Bruc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Combat Systems Technology, 1949-2010*.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1.
- Elleman, A. Bruce. *Taiwan Straits Standoff: 70 Years of PRC-Taiwan Cross-Strait Tensions*.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21.
- Elleman, A. Bruc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vy: Special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9.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蘇聖雄，〈蔣經國在臺軍事權力的建立：以與王叔銘交往為中心的探討（1950-1965）〉，《臺灣史研究》，第31卷第4期（2024年12月）。
- 蘇聖雄，〈戰爭論——蔣中正與西方兵學在臺灣的發展〉，《漢學研究》，第41卷第2期（2023年6月）。
- 蘇聖雄，〈間接路線：蔣經國與反攻大陸特種作戰〉，收入《冷戰與當代東亞國際政治秩序1950-1989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4年。